

(上接 08 版)

据央视记者的调查,张启刚的班主任回忆,4个孩子从5月8号开始就都没上学了。这一个多月里她和邻居还有村干部去家访很多次,始终敲不开门见不到人,但通过邻居能确认他们在家。中间有一次曾敲开过门,最小的一个妹妹打开最里面的门告诉他们,说哥哥不让去上学。有一次村干部敲门后,张启刚向他承诺说会让妹妹去上学的,但也没有兑现。

尽管对教育质量有争论,但教育是一种义务,基本的义务教育体系也早已建成,这是不争的事实。

心理问题缺乏重视

贫困、教育不是主要的直接原因,那么究竟这四个孩子为什么会自杀呢?要使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找到悲剧产生的原因。随着警方对张启刚遗书的披露,心理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是什么让一个孩子发誓活不过15岁?

贵州省民政厅披露的家庭情况给出了一定的答案。

“张方其、任希芬夫妇在海南生活期间有打骂孩子情况,长子张启刚曾被父亲责打手臂脱臼,耳朵被扯伤留有疤痕。2011年回乡后,夫妻感情恶化,时常吵架和打闹,男方曾将女方打伤

住院。女方于2013年2月离家出走,随后男方时常外出打工,家庭日常事务主要由长子张启刚承担,包括照顾三个妹妹、饲养生猪等。在父母先后离家后,4个子女性情发生变化,不愿与外界接触,经常闭门不出,甚至亲属也叫不开门。”

而自杀事件发生后,村民拨打了100多次张方其留下的联系方式也没有联系到他的事实更让人无语。

父母的不合,长期的留守生活,对孩子的心理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并不是孤例。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针对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中12个县(市、区)的调研显示,留守儿童负面情绪重,女童尤其自卑。46.0%的留守儿童会感到烦躁,39.8%会感到孤独,37.7%会闷闷不乐,19.7%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在此前,无论是政府还是人们的公益慈善行为,着重关注的都是留守儿童的就学和生活。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义务教育的投入,加上民间扶贫助学的努力,已经为解决这两类问题建立了系统的体制机制,需要努力的是不断查漏补缺,提高水平。

而留守儿童的心理等精神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少体系建设。

社工介入心灵救护

谁来抚慰留守儿童的心灵



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发起的“七天支教”活动不同于传统的短期支教,他们将课程着眼于安全教育、卫生教育和生理健康等,这些短期课程,正是留守儿童教育中缺失的部分。

呢?陈日发表示,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王勇国务委员的批示要求,民政部决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督查,重点督查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会同财政部进一步抓好“救急难”综合试点,帮助群众及时解决生活困难,在提供物质救助的同时,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

陈日发提到的社工,是一门助人的专业,相对于医学关注在人类生理运作,心理学关注在个人心理现象,社会工作的焦点在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目的在协助个人、家庭、团体、社区能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脉络,增强或恢复其社会功能的能量,及创造有利于达成目标的社会条件的一种专业活动,以预防或舒缓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在基层开展,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区域会落实并针对具体的社区和人,长期开展工作。这就与一般的公益慈善组织捐钱、捐物资的一次性或短期性帮助区别开来。

对于儿童工作,社工既可以驻校,也可以在社区开展工作。通过小组、个案等专业服务解决儿童的各种成长问题。

社工的介入,对构建留守儿童与父母亲人的和谐关系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开通的“留守儿童热线”,就是一个同时关注工厂父母与学校留守儿童

并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综合性项目。项目人员分驻工厂与打工父母孩子集中的老家学校,以孩子与父母能够无障碍沟通为目标。

如果张启刚等四个孩子与父亲之间不是长期处于事实失联状态,如果当地有社工提前介入,悲剧或许不会发生。

目标:到2020年广泛参与

2014年5月1日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作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

问题是,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展仅有三十多年,对很多地方来说还是新生事物。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发展较快,但同样面临政策、资金、人才、进入社区、项目等多方面问题。

贵州这样的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明显滞后,“目前全省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约有1万多人,主要包括省民政厅近年培训的全省上万名社工人员及通过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资格考试(持证)的627人。”贵州省社工中心主任助理罗蓉在贵州国际社工日宣传活动期间介绍,持证社工中有约一半在贵阳。据测算,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至少需4万多名专业社工,目前仍存在三万多人的缺口。

作为主管部门,民政部设有社会工作司,着力促进社会工作在全国的发展。而查阅毕节市民政局的机构设置,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社工科室。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18个省(市)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而贵州省级目前尚没有此类组织。

6月10日,民政部网站公布了民政部、财政部5月4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争取到2020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广泛参与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普遍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与方法的局面初步形成,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的可及范围和受益人群显著扩大,专业作用和服务效果不断增强。同时要求从投入力度、教育培训、研究宣传、工作试点四个方面切实加强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的支持保障。

社工介入的速度将有可能得到提升。

当然,社会工作不是儿童心理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陈日发表示,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在依托有关部门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毕节4名孩子离开后,有人探访孩子的家,简陋的生活环境令每个看到这样景象的人心里都很难受。

声音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

毕节事件凸显中国城乡差别已不是差别,而是鸿沟,是吞噬生命的大裂谷。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都知道那一刻的恐怖,但现在那种恐怖时时侵袭着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孩子。关注农村、守护生命,不仅是关注孩子,还有他们在外打拼的父母、在家种地的爷爷奶奶。不是用怜悯同情和大包大揽的方式去救济,而是支持他们以合作与联合的方式真正自己站起来,改变现状,做生活的主人。这绝非小修小补、个别救济政策能奏效的,三农领

域的深刻改革不仅涉及多领域,而且直接关乎生命的存续。并非只要经济上去乡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到了必须抛弃三农领域的单纯经济观点,树立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彻底的改革观的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我们的政府应该开始对留守儿童问题负责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剥夺不负责任监护人监护权的政策出台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具体队伍来落实这些政策。我们的父母都很爱孩子,但是他们缺乏

知识,有研究认为我国40%的家庭都有不同程度虐待孩子的行为,其中4%的家庭尤为严重。所以这样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行政系统来监测不负责任的行为,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这是现在应该被提上日程的问题。

我们急需建立起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短板,不仅需要立法,同时还要有比较强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资金、有相当多的政策优惠。如果地方政府只是简单强调政策,却在无钱、无机构、无专业化人员的“三无”状况下工作,就很容易发生这些难以

管理的现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出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村又无人照顾。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儿童的心理关爱尤其缺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

完整的儿童保护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作,但留守儿童保

护工作已是燃眉之急,我们是否可以从最危急的人群入手,针对6000多万留守儿童中的205万独居儿童提供紧急保护计划?首先,可以建立留守独居儿童保护问题的数据档案、信息管理系统。这项工作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牵头,每个公益组织都可以在自身服务的学校、社区先行开展,让这些数据成为制定有效干预策略和实施保护方案的基础;其次,开通留守儿童热线服务,为处于困境的儿童提供各项服务和保护;第三,民间组织可以起到所在地留守独居儿童保护的宣传、信息报告、短期照顾、资源协调、协同保护和监测作用。(高文兴/整理)